

抗战与战后中国

杨天石 著

杨天石
近代史
文存

章太炎的不屑反映了近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困惑。他们失望于西方民主模式，而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能向后看。然而，向后看又是没有出路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威权制走向民主，而不是从民主复辟专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鸦片战争中，中国人被西方打败，于是转而学西方，开始学坚船利炮与声光化电，后来学民权与立宪，再后来学民主与革命。到了1911年，民主与革命的调子高唱入云，拿破仑、华盛顿这两位资产阶级革命的鼻祖也就成了极点。其后是大批人出洋，章太炎本人也于1905—1906年到了正在学习西方的日本。

有，不对了，所谓民主，不过是富人的民主，而且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怪事和丑闻。于是，失望、恼怒之苗油然而生，拿破仑与华盛顿的身价也随之暴跌。在《官制东隐》中，章太炎激烈地指责西方的选举制度，认为所谓代议士——议员——大都耗资巨万，靠贿赂入选，与中国的行贿得官并无两样。他说，民主立宪，世人都以美、法两国为榜样，但现在法国的政治，全靠贿赂，美国入也要通过行贿才能致身显贵，实在一蟹胜一蟹，其所以幻想手持金椎，以拿破仑、华盛顿的头作为被伐对象者，盖为此也。章太炎这个人受冲动了，又不懂得历史主义，其幼稚、偏激之处，读者原之！——那么中国怎么办？

章太炎想求想去，觉得西方民主的脓疮是议会，于是按捺经营，洋洋洒洒地写了《代议然否论》，主张代议必不可行，议员绝不可选。同时提出了一个从多方面、恢复民权、限制元首的方案。例如，提高法官的权力，不论是总统，还是法官，有了过失，或者溺职受賄，法官都可以征之、逮之、治之。倘若法官执法不公，老百姓可以要求“学官”——一批法学家来共同处理法官等等。然而，不知道是章太炎觉得这个方案未必可行，还是因为对中国历史过于有感情了，他有时又觉得，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并不坏，开元、贞观年间，中国不也治理得很好吗？于是，他又表示，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效理。甚至说：

抗战与战后中国

陈永发 著

中国

中国现代史学名著丛书

抗战与战后中国



杨天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与战后中国/杨天石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杨天石近代史文存)

ISBN 978-7-300-08279-0

I. 抗…

II. 杨…

III. ①中国国民党—政治—研究②国共合作—研究—1937~1945

IV. D693.74 K26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5967 号



杨天石近代史文存

抗战与战后中国

杨天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8879833

编辑热线:010-88879860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44 插页 3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0 000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书著者在台湾花莲

序 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金冲及

在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众多研究工作者中,杨天石同志取得的成绩是相当突出的。

为什么他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他极其重视发掘近代史中以往很少为研究工作者所了解的珍贵史料,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原始档案,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因此他常能讲出新话来。本来,史学工作者必然论从史出,这几乎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垣教授,曾提倡对史料要做到“竭泽而渔”。可是,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学者常有一种苦恼。和古代史不同,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研究工作者根本谈不上“竭泽而渔”,倒是常要“望洋兴叹”。在这种情况下,要能识别并发掘出前人没有利用过的珍贵史料又谈何容易。杨天石同志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勤奋。他不仅经常深入国内一些重要档案馆和图书馆,细心搜罗;还不知疲倦地奔走于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以及台湾地区,披沙拣金。他有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就叫《海外访史录》。此中甘苦,凡多少做过一点儿这类工作的人,大概都能领会到。二是有敏锐的识别力。这需要有扎实的功力和犀利的眼光,能够分清什么是沙和什么是金。否则,再重要的史料放在那里,也可能因不认识它的价值而交臂失之。杨天石同志恰恰具有这两个条件。

第二,他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他另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叫《寻求历史的谜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研究工

作,从它的本来意义来说,无非是要解开包括自己在内原来弄不清楚的谜团,寻求符合实际的答案。如果只是把一些历史事实叙述得清清楚楚,却没有回答什么人们原来感到迷惑的问题,这种著作或论文也有它的用处,但很难说是有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杨天石同志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旧说中发现疑点,提出问题,经过严密的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他的论文《中山舰事件之谜》,运用可靠的原始档案,对一个人们普遍关心而又不明其所以的问题,起了释疑解惑的作用。我曾听胡乔木同志称赞过这篇文章。

第三,他的文章思路清晰,明白晓畅,读起来没有沉闷的感觉,容易引人入胜。写文章,是要给读者看的,落笔时应该处处替读者着想,而不是作者在那里自说自话。如果文字晦涩,思路不清,让人看得十分吃力,甚至看不下去,再好的内容也难发挥作用。杨天石同志这个优点也是值得称道的。

这三点,也许同样是这部《文存》的特色。

这部《文存》中的文章,绝大部分有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国民党曾经统治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二十多年。它的种种活动和作为,在中国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有些还产生长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同它两度合作,一次是大革命,一次是抗日战争;又有两次破裂,一次导致十年内战,一次结束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作为历史对象,作为了解中国近代国情的需要,我们对国民党以及它对中国大陆统治的研究,实在太不够了。不深入进行对它的研究,中国人在20世纪是怎样走过来的,在不少方面就不容易说得清楚。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来说,如果不研究这个既是对手,又是两度合作伙伴的国民党,许多事情的认识也难以深入。

从事这样一项开拓性的又相当敏感的研究工作,谁都很难一下就

做到什么都说得准确无误或能取得所有人的同意,引起一些争议是自然的。我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和杨天石同志的看法都相同。记得有一次在美国,我对他《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那篇文章也提出过商榷性的意见。这些,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是正常的。

杨天石同志对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许多问题,经过他的潜心研究,已把人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问题,虽然存在争议或有不同意见,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它对推进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这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2007年6月24日

于北京万寿路

序二 以文会友——天石与我

台湾政治大学 蒋永敬

一

我对杨天石先生(以下称天石)的神往,是读到 he 发表于 1988 年第 2 期《历史研究》上的《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以后凡是天石发表的文章,只要能见到,我都仔细地阅读。1991 年 9 月,我到北京初次与天石见面,我们是一见如故。交往久了,我们总是有谈不完的话题。说也奇怪,近年由于听力衰退,与别人谈话,总觉听力不行;但和天石谈话,则仍正常。我问过天石,为何如此?天石说:大概是因为他的听力也较差,说话声音较大之故吧。同样情形,别人和我谈话,虽然大声,我还是听不大清楚。我想,应是我与天石“心灵相通”的原因。

自从认识天石以后,他每有新的著作问世,必定尽快送我一份。重要者有如《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民国掌故》(收入与多位学者发表的文章)等。总计有 120 多篇天石的作品,我大部分都读过。此外还有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我曾为此书作过“评介”。这次《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即将出版,将天石历年来的著作,有系统地整理、收存起来,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天石的著作,每篇都是

精心之作,有新资料、新见解,富有启发性。这部《文存》的出版,对于近代史学,也是一大贡献。天石由北京来电话,并传来《文存》的目录,嘱我为之作序,兴奋之余,愧不敢当,但也不愿放弃这一大好机会,来表白我对天石才华的钦佩。故愿借此机会来谈谈天石与我在史料、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琐事,题为《以文会友——天石与我》,以代序焉。

二

首先来谈谈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对于我的启示。我曾在台北《传记文学》介绍过天石这篇文章。在我的回忆录《浮生忆往》中也有详细的记述。大要如下:

近代史中两大疑案不易解决,一为1926年3月20日之“中山舰事件”,一为1936年12月12日之“西安事变”。此两事件均为蒋介石亲身经历之事,过去多年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当事人蒋介石对此两事件之经过,曾有多次之陈述;与此两事件相关之人士亦有各种不同之记述,还有多种其他相关文献,互有出入与矛盾,故欲了解此两事件之原因、真相,至为困难。研究者多,难有满意之结果,久为“历史之谜”。幸此两“谜”为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二杨”解开之。“二杨”者,即杨天石与杨奎松也。

杨天石首次利用中山舰事件档案数据,解开中山舰事件之“谜”。我为补正过去研究此事件之不足,乃撰《中山舰事件原因的考察》一文,刊于1989年10月之《历史月刊》第21期,介绍杨天石之发现,并就此事件之背景、原因作一考察,此时尚不识杨天石其人也。留美学者李又宁教授已访问北京多次,谈及杨天石的研究。我问天石何许人也?又

宁曰：与汝当年相似，乃“一表人才”也。

我对中山舰事件之研究，曾于1984年4月参加在台北举办之“中华民国初期历史”学术研讨会，发表《3月20日事件之研究》一文，所用资料，以国民党党史会收藏者为主。就当时情况而言，应须参考之数据皆已尽可能地利用之。评论人刘凤翰曰：“蒋教授在这篇论文中，对事件的背景、事件的发生与处理，都达到求真的目的。所用的方法与数据被史学家所接受，其结论将被史学家所肯定。”此事件之关键问题，为李之龙是否承汪精卫之命，对蒋介石进行谋害？据蒋之多次陈述，似是如此，而汪及共方则否认之。研究者苦无直接证据可资断定何方所述者合乎事实，于是成为“悬案”。一般论著对此事件资料之采信，各有不同尺度。“右”者采信蒋方之资料，“左”者采信汪及共方之资料，而对对方数据常质疑之。我之论文，两说并陈，而以第三方面之资料佐证之。凤翰评之曰：“蒋永敬教授这篇论文，写得严谨、公正，而有学术上永久价值。”但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未出现前，凤翰之言，尚难否定也。我在《中山舰事件原因的考察》一文中介绍天石对“解谜”之贡献曰：

中山舰的调动，是否为汪、共劫蒋之阴谋？尽管各方有不同的陈述，而其关键所在，李之龙（中山舰舰长，中共党员）有无矫令调舰行为，应该考察当时中山舰调动的真实情况。为了解这种情况，对于当时调动中山舰有关人员的陈述，须加以考察和对证。调动中山舰有关人员除李之龙本人于1927年在汉口发表《汪主席被迫离职之原因、经过与影响》一文中“派舰经过”外，其他有关人员如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王学臣，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军校办公厅秘书季方，副官黄珍吾等，因与调舰事有关，均在事件发生的当时留有笔录。这些文件的日期，都是在1926年3月24日到31日之间。从这些文件来看，李之龙并无

矫令调舰行为。杨天石的《中山舰事件之谜》，首次利用了这些文件，解开了此一事件多年之谜。

其后天石又发表《中山舰事件之后》一文，对于汪精卫为何突然隐匿，既而悄然出走，蒋介石为何一路顺风，掌握了国民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以及事件后苏联顾问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作用等问题，诚如作者所云：“史学界都还不完全清楚。”为求真相，天石运用诸多可信资料，作出精辟的解答。

天石这两篇中山舰事件研究，愿以刘凤翰对我《3月20日事件之研究》之评语“写得严谨、公正，而有学术上永久价值”，让之天石。

三

我对天石的才华，十分欣赏；但不迷信其“权威”，总想找个机会，与之挑战，以尽“以文会友”之道。

1996年，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六十万言的巨著出版了。这是一部水平很高的著作，到目前为止，在同类的著作中，难有出其右者。我曾以挑战的心情，作一“评介”，提出五点意见：一点表示肯定与欣赏，两点讨论，两点挑战。讨论不谈，先谈肯定与欣赏，再谈挑战。肯定与欣赏是认为本书有“新的资料和新的内容”，节录如下：

本卷重大特色之一，是采用了大量的档案数据。这些资料不仅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方面的，还包括中共方面的；不仅包括中文

的,还包括英、俄、日文的。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当事人的“个人”资料,如《蒋介石个人全宗》、《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蒋介石日记类抄》、《冯玉祥个人全宗》、《吴稚晖个人全宗》、《张静江个人全宗》等。大多是由本书首次引用,其价值之高,可以想见。要使著作有创新的内容,就必须充分利用新的数据。人云亦云,陈词滥调,徒使读者乏味。而本书在新数据方面的利用,确居优势。(举例略)

挑战的两点,一是“抓漏”,一是“找碴”。“抓漏”方面,抓出编者的马虎,把几种不同的资料,糅合在一起。“评介”的标题为《引用资料不可马虎》。节录如下:

鲍罗廷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变化,实即标志着苏联、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变化。此一关键性的问题,从本书相关的记述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例如为了迁都武汉之争,鲍、蒋之间发生了一次正面的冲突。本书对此记述(略),颇为生动。资料来源,据注是根据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载于1927年5月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但就我手头现有的资料来查证,这段记述,并非完全出自蒋的《讲演词》。(举例略)把这几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凑合在一起,未注据蒋的《讲演词》,这就显得有些马马虎虎了。同时,对于鲍、蒋两人的争执,以及是非曲直问题,著者显然认为蒋有不对之处,说“事实证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

蒋介石在武汉对鲍有无“允诺”,是须加以查证的。按鲍在1月15日(1927年)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发言中,对蒋所提意见,表示“赞同”,并认为“亦无不可”。这段发言记录,该书略而不采,今补充之(略)。“找碴”

的一点，“评介”的标题是《过度曲护有碍历史真相》。该书对武汉分共时宋庆龄坚持“三大政策”颇加肯定。我知此一肯定，似非出自天石之笔。此书既为其主编，乃有意向之“找碴”。其文如下：

孙中山有无制定“三大政策”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经过近年中外学者的研究，认为孙中山生前，并未提出此一特定的政策，更无此一名词的确立，而是在他去世一年多以后，始由中共人员提出来的。如果把“赝品”视为“真货”而肯定之，便使学术性大为减色了。

后来天石有两篇论文，似在回应我的挑战，一篇是《北伐时期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斗争》，其中有“迁都之争”一项。另一篇是《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尤其后一篇响应我的“找碴”甚为明显，如该文结语所云：

“三大政策”这一概念形成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末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它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党的一个比较精确的概括。应该承认，所概括的三方面确实都来自孙中山，不是赝品。

天石此文，把“三大政策”的概念形成，提前到1925年10月，似乎早了些。此时应是酝酿，而非形成。形成的时期，应是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之日。天石根据这天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出版《总理周年纪念特刊》所载施存统（当时是共产党员）以“复亮”为名发表《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一文。即如天石所云：“空前明确地提出了‘三大革命政策’的概念。”过去对此概念形成和“三大政策”名词的

出现,只追踪到1926年10月,天石此文把它提前7个月,这是一大发现。

这一问题,由于中外和两岸学者多年来的探讨,大致已有定论。这一概念和名词是在孙中山去世以后,由共派方面的人士概括而来,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历史上很多概念和名词,都是后来概括而成的。例如“辛亥革命”、“联俄容共”等名词,都是如此。所以天石说它“不是赝品”,也是有根据的。

四

我对天石之文的另一次挑战,是2005年10月在台北举行之“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研讨会。天石发表的论文为《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大会安排由我评论之。天石此文认为蒋介石对这个“底”曾有四次改变、四个层面,即四个“底”。我则认为只有两个“底”,即卢沟桥事变“底”与珍珠港事变“底”。前者为不澈底之“底”,后者为澈底之“底”。原稿节略如下:

天石此文所表现之特色,一为精彩选题,可谓“小题大作”,用一个“底”字来贯串整个抗战过程中重大问题。次为精彩选材,此文多以第一手原始数据完成之,特别是1939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演讲《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成为天石研究“底”的根据。蒋介石此一演讲,十分坦率,在当时有高度之机密性。存于国民党党史馆,迄未公开。天石以此文件所解释的“抗战到底”之“底”来量蒋介石以后对“底”解释的变化。天石根据五中全会以后的文件,认为蒋对“底”作了“新解释”,改正前“底”(五中

全会的)“错误”。改正有两点,一是将“底”追溯到九一八事变(收复东北),一是将“底”扩大为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联系起来。

此两点是否为改正前“底”之“错误”?这要看在前“底”之前的蒋介石文件有无和“新解释”相同之处。据我的了解,这种“新解释”在五中全会前或五中全会中的演讲里已经有了。例如蒋介石1938年9月18日《告东北同胞书》中有云:“此次牺牲,发动抗战,即为恢复东北失地。”关于中日问题须与世界问题联系起来,蒋的五中全会演讲即有详细说明,他说:“中日问题,无法单独解决;要解决中日问题,一定要解决远东问题;远东问题即是太平洋问题,必须在解决太平洋问题中获得一个结果。”

太平洋问题如何解决?一是和平,一是战争。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倾向和平解决;此后则为战争解决。天石文中引用一件极为机密而极重要的文件,为1940年8月在蒋介石指导下起草的《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要》,有两大底限,一为战争底限,一为和平底限。战争底限名曰“最大之成功”,和平底限名曰“最小限度之成功”。这是天石一大发现。从这一文件,可以看出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是求“最小限度之成功”(和),之后是求“最大之成功”(战)。结果“最小”的未能成功,而“最大”的反而成功了。正如胡适在抗战期中有句名言“和比战难”。依此文件,我认为“抗战到底”之“底”只有两“底”,一为卢沟桥事变“底”,不澈底之“底”,一为珍珠港事变“底”,乃澈底之“底”也。

评过天石此文以后,想到1986年10月在台北的“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中,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蒋中正先生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方针——抗战到底》,两相对照,异同互见。19年后,有幸评论天石此文,亦乐事也。

五

天石精于资料的搜集,他所探讨的问题,颇多我曾经思考而未能解答的。例如他对胡汉民的研究,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曾接触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著作发表过。在读到天石的《蒋胡“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和《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所藏胡汉民档案》后,使我深感过去研究的不足。对于他的发现,也引起我去思考存疑未决的问题。例如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一文,就使我想起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因解决国共纠纷而由国民党中央于1924年8月通过的《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国民党档案中,列为“极机密”。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讨论到通过时,鲍罗廷和中共瞿秋白都曾与会。此案全文早已收入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迄未引起学者的注意。胡汉民1930年在南京向新亚细亚学会演讲《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提到他1925年到1926年间在莫斯科“提议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的经过和原因”,显然与前项决议案有关。2004年,我在广州“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发表《孙中山与鲍罗廷》一文,曾提到这一决议案问题。再阅天石的《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一文,可以看出从孙中山、胡汉民到蒋介石,对中俄、国共关系的改善,都曾有过强烈的需求。共派人士提出的“三大政策”,亦为需求国共合作关系的维护。然而终致决裂者,此亦值得深思之问题也。